

家庭因素对育龄劳动力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陈璐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1;

摘要: 目的 分析当前各家庭因素对育龄劳动力生育意愿的影响。方法 文章使用 Poisson 回归模型与 OLS 回归模型对 3063 份样本数据进行处理, 研究家庭因素中性别观念、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养老观念、家庭规模对育龄劳动力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 首先, 持有传统性别观念和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的育龄劳动力生育意愿更高, 同时家庭规模也会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即家庭规模越大生育意愿越高。并且, 以上变量对不同性别和育龄段人群产生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其中工作—家庭冲突仅对男性群体生育意愿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 政府可以坚持推进两性平等, 推动传统生育观念的转变、通过统筹完善家庭支持政策, 构建家庭发展体系, 减轻家庭生育负担、注重生育政策的宣传与生育文化的塑造。

关键词: 家庭因素; 育龄劳动力; 生育意愿

DOI: 10.69979/3029-2700.25.03.087

人口结构转变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自 2004 年以来, 我国进入“刘易斯拐点”, 曾经依赖巨大人口基数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在逐渐消失, 生育率逐年下降我国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2022 年我国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出生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出生人口也首次跌破一千万, 中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人类的生育行为和人口再生产都是依托于家庭这个基础性的社会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变迁, 传统的家庭功能受到冲击,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削弱了家庭对育龄群体生育的支持作用, 增大了生育风险对家庭的负面影响。因此面对生育率持续下降、社会生育意愿低下等问题,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认识到不仅要宏观政策角度发力, 也要从个人、家庭角度寻求突破点。

家庭作为生育的基础社会制度, 已经有许多研究者分别从家庭因素的不同侧面分析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家庭因素研究中, 部分基于中国国情的部分研究表明, 家庭中传统的性别观念与生育意愿之间呈现出正向的相关关系^[1], 同样,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是影响劳动力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2]。受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习俗和养老保障观念的影响, 中国家庭自先秦时期就建立起了以家庭养老为主线的养老体系, 影响了当代大部分居民养儿防老的观念^[3], 家庭的养老功能表现出育龄者对子女数量的追求。除此之外, 生育是家庭经济生产的重要方面, 生育不仅面对子女的出生问题, 更重要的是子女抚养能力问题。在人口较多的家庭中, 会有

更多的角色分工, 生育和养育幼儿的成本可以由各个家庭成员进行分担, 父母更加容易获得来自家庭的照料支持, 从而减少生育行为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家庭的生育率会高于小家庭^[4]。

在此基础上, 文章运用 CGSS2021 数据库深入分析当前各家庭因素对育龄劳动力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 以期为我国构建精准且积极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家庭支持政策以提高社会生育率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文章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21 年数据 (CGSS2021) 进行分析。该调查主要涉及中国居民生活、工作以及家庭等基本信息, 通过持续调查中国居民的行为、观念以及社会结构来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形与势。本研究对象为育龄劳动力群体, 筛选截止调查时间年龄为“20 岁—49 岁”的样本对象, 并剔除“不知道”、“拒绝回答”等样本后, 预筛选得到样本 3063 份, 其中男性样本 1311 份, 女性样本 1752 份。

1.2 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生育意愿, 用期望孩子数量来测量生育意愿是相关研究的主流做法^[5], 该数据来源问卷中题项“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 您希望有几个孩子?”。该变量为计数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因素，家庭因素从性别观念、工作一家庭冲突、家庭养老观念、家庭规模 4 个方面探讨。

参考石林红^[6]的研究，“性别观念”根据问卷的性别能力倾向 A42 题“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设定，该问题选项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无所谓、比较不同意、完全不同意”5 个等级，同样取值为 1~5 分。

“工作一家庭冲突”根据题项，“您的工作妨碍了家庭生活”设定，并且根据选项“从未有过、很少、有时、经常、一直如此”，赋值“1~5”分。

“家庭养老观念”文章参考相关学者的做法，根据题项“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该问题选项设有“主要由政府负责、主要由子女负责、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将选择“主要由子女负责”选项的样本赋值 1 表示具有家庭养老的观念，选择其余选项的样本赋值 0。

“家庭规模”根据题项“请问除您以外，您家里还有几个人？”设定，该变量为计数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类型、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经济水平。

1.3 统计模型

本研究使用 Stata18.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Poisson 回归分析检验家庭因素对育龄劳动力生育意愿的影响情况，采用 OLS 回归进行稳健型检验。

文章在探讨家庭因素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中使用的基准模型如下：

$$Children_i = \alpha_1 + \beta_1 Family_i + u_i + \varepsilon_i \quad (1)$$

$$Children_i = \alpha_1 + \beta_1 Family_i + \beta_2 X_i + u_i + \varepsilon_i \quad (2)$$

模型（1）用于测试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模型（2）则加入了控制变量。其中， $Children_i$ 代表个体 i 的生育意愿，用期望子女数量表示； $Family_i$ 为家庭因素； X_i 代表基于受访者对相关的回答得到一系列的个体特征变量、配偶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以及社会特征的控制变量； β_2 为各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扰动项由 $(u_i + \varepsilon_i)$ 两部分组成； β_1 和 β_2 是本选题关注的核心参数，表示各家庭因素对于育龄劳动力群体生育意愿影响的程度及显著性。

2 结果

2.1 基准回归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Poisson 回归结果显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传统性别观念、家庭养老观念以及大家庭规模都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结果仍然显著。工作一家庭冲突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有着负向影响，但是结果并不显著。控制变量中，年龄、民族、户口类型、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均对生育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且 OLS 回归分析结果与 Poisson 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2.2 异质性分析

按照性别、年龄段进行分组的回归结果，分析各家庭因素对育龄劳动力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差别。根据回归结果，传统性别观念对男性群体的生育意愿和低育龄段群体的生育意愿促进作用较强；工作一家庭冲突仅对男性群体的生育意愿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养老观念仅对女性群体的生育意愿和低育龄段群体的生育意愿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规模对男性群体的生育意愿和高育龄段群体的生育意愿促进作用更强。

3 讨论

本研究基于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聚焦于各家庭因素对在职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性别和育龄段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家庭因素方面：性别观念越传统、家庭养老观念越重、家庭规模越大的育龄劳动力生育意愿更强烈；（2）异质性方面：传统性别观念对男性群体的生育意愿和低育龄段群体的生育意愿促进作用较强；工作一家庭冲突仅对男性群体的生育意愿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养老观念仅对女性群体的生育意愿和低育龄段群体的生育意愿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规模对男性群体的生育意愿和高育龄段群体的生育意愿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以上结论，为减轻当前我国生育水平下降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本文提出如下讨论和建议：

第一，坚持两性平等，推动“传统生育观念”向“幸福生育观念”转变。性别观念趋向于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总体趋势。虽然研究表明现代性别观念会对生育意愿有抑制作用，但其抑制的是由于传统观念所带来的“不得不生”的那部分生育意愿，因为大多数育龄群体会迫于社会和家庭压力，保证至少生育一个子女。

因此,可以通过宣传和坚持两性平等观念,让男性主动承担更多家庭分工角色,在家庭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减轻女性成员的照料负担,提升家庭幸福感,从而实现生育意愿的提升。引领“传统生育观念”向“幸福生育观念”转变,是将生育动机由“外”转到“内”,即通过政策手段推动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将“女性的天职是生儿育女”的传统认知改变,让其在感受到家庭性别观念转变带来的获得感、生活幸福感,同时也能在社会及工作领域获得足够的尊重和人文关怀,进而改善现代性别观念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

第二,统筹完善家庭支持政策,构建家庭发展体系。影响生育意愿的家庭因素是多样的,家庭作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场所,对提升生育意愿可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中家庭支持政策不应仅考虑到生育本身,还应在婚姻、养育、教育以及养老等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关键点同时发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政策体系,为家庭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托底。总之,将“不敢生”、“不想生”、“想生不能生”转变为“愿意生”的现实难题,是需要政府应尽可能采取措施,从各个方面降低家庭因生、育带来的成本,让育龄劳动力群体在将生育意愿转化为切实生育行为时减少顾虑,进而提高生育率。只有全方位地支持和改善家庭发展内生动力,才能创造一个有利于生育的良好家庭与社会环境,促进育龄劳动力群体生育意愿回升。

第三,加强生育政策宣传,重塑育龄人群生育文化。近 40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收获了显著的政策效果,避免了我国发展前期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发展问题和资源短缺问题。并且,长期“生男生女都一样”、“少生、优生、幸福生活”的政策宣传大幅提升我国性别平等水平和生育主体意识。但是,同样在这种长期的限制性生育政策文化的浸润下,在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为主导形成的少孩生育文化中,人们已经习

惯了低生育选择。同时,当前的生育主力为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生的群体,“在生育观念上 80 后开始逐步脱离传统生育理念限制,对子女的性别偏好降低,养育过程中注重质量,90 后更加注重生育的幸福体验,相比于个人事业发展和生活质量生育属于次要地位”^[7]。目前,面对我国全开放性的生育政策所主导的“多孩生育文化”,人们所形成的“低生育文化”在短期内还未转变,从而导致现行生育政策红利的非持续性。因此,重视多孩生育文化的重塑,引导育龄劳动力群体转变少子生育观念,可能会对生育政策发挥持续性效应以及社会生育水平的回升产生基础且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姜春云.性别角色观念与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基于性别差异和社会变迁视角的分析[J].兰州学刊,2022,(05):92-104.
- [2]胡安荣,杨明媚,包玉泽.工作家庭冲突对城镇职工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3,29(03):34-48.
- [3]何兴邦,王学义,周葵.养儿防老观念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基于 CGSS(2013)的经验证据[J].西北人口,2017,38(02):31-38+53.
- [4]周福林.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影响的研究[J].西北人口,2015,36(01):17-20.
- [5]高亚飞,吴瑞君,王金营.土地财政、市场化改革与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经验证据[J].人口与发展,2024,30(05):72-83.
- [6]石林红.政策态度、性别观念对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 CGSS 数据库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管理,2023,38(07):38-46.
- [7]杨宝琰,吴霜.从“生育成本约束”到“幸福价值导向”——城市“70 后”“80 后”和“90 后”的生育观念变迁[J].西北人口,2021,42(06):36-46.